



## 欧罗巴，你为什么暴躁？

58%，而在千禧一代中为 50%。报告指出，在住房支出方面，高收入人群逐渐吸收中产阶层越来越多的资源，目前，住房开支约占西班牙中产阶层家庭支出的 33%。这一比例在 2005 年时为 29%，而在 1995 年时为 24%。事实也证明，震撼西班牙的加区骚乱中，当地“千禧一代”是主要参与者，而且该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应和者。

### 旧的“契约”烧了

在法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·吉吕眼里，这些以年轻人为主体，各个年龄层、各个职业都参与的运动，体现了过去四十年来欧洲大众阶层在社会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进程。在他们看来，以往构成中产阶级基础的工人、职员、个体户、农民、公务员等等成了全球化经济模式的牺牲品，自己在这—进程中没有位置。而他们也不再被政界、媒体和学术界视为具有代表性的群体，变成精英眼中的“可怜虫”。这种蔑视是引发仇恨的关键，实际上，遍布欧洲的抗议运动凸显了西方综合危机。美国哈得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鲁诺·马卡埃斯说，欧洲发生的一切，是对其丧失世界霸权的“报应”，“过去，由于殖民霸权存在，帝国的战利品会流向下层阶级，使之与掌权者和解。可是这一切在二战后完全改变了，欧洲精英再向别国发号施令是不可思议的，他们口袋里也不再化解矛盾的筹码了”。

根本上，二战后，西欧基本形成受政府调控、强调再分配、但仍以市场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

家，经济财富经政府“向赢家课税”和“救助落后者”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新分配，让需要补贴才能活下去的人支持这一基于利害关系的“社会契约”。但它所产生的经济盈余却跟不上政治补贴的胃口。马卡埃斯指出，失去对东方殖民地的剥削后，欧洲国家从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增长中获取盈余，主要靠两项输入的产物：工作时数和每个小时工作的质量。前者是人口统计变量，后者是劳动生产力变量。在欧洲，人口状况和生产力对 GDP 增长的贡献，过去四十年来都逐渐降为零，有些国家甚至低于零。西方人口老龄化先在日本显现，接着在欧洲蔓延，每年工作时数的增长不像 1945 年至 2000 年间那么快，那时五六十年代婴儿潮的新增人口陆续加入劳动力大军。由于 GDP 增长盈余鲜有增长，社会黏合剂不得不靠债务来融资，举凡出现动乱的欧洲诸国，公共债务都升至 GDP 的 100% 以上，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·罗戈夫和卡门·莱茵哈特已证明的，一旦政府债务超过 GDP 的 90% 左右，经济增长通道就容易堵塞，供重新分配的盈余也就所剩无几了。

恰恰在 40 多年前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从英国发端，然后被兜售到整个欧洲，它承诺提升增长率，可核心是将职场力量平衡倒向资方，把人当成工资的奴隶，确保增

长果实为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占有。全球投资公司格兰瑟姆—梅奥—范奥特洛公司（GMO）分析师詹姆斯·蒙捷和菲利普·皮尔金顿发现，1979 年至今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欧洲国家有四大特征：放弃充分就业，代之以通货膨胀目标制；加剧人员、资本和贸易流动的全球化；聚焦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非重新投资和增长；追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，瓦解工会和工人组织，让资方用更多收益投入再生产和技术创新。以这四大支柱中的最后一个为例，其逻辑是“工会与最低工资是有效劳动力市场的障碍”，集体谈判和法定最低工资将导致工人薪水高于市场数字，结果是企业撤离，失业率必然上升，应当尽可能削减最低工资。但蒙捷和皮尔金顿却发现，这种对劳动力市场绝对灵活性的追求，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，像过去十年英国个人税额抵免的申请急剧上升，因为公司只愿向员工支付勉强糊口的低薪而让政府兜底，况且既然有低成本劳动力，又何必费劲去投资促进生产力的新设备和新技术呢？

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保罗·科利尔承认，过去 40 年，欧洲国家对严重的社会分裂听之任之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马塞尔·戈谢曾对他说：“欧洲的可悲，在于国民没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和归属感，过去‘社会契约’已被烧了。”



过去 40 年，欧洲国家对严重的社会分裂听之任之。“欧洲的可悲，在于国民没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和归属感，过去‘社会契约’已被烧了。”

